

從孝道外包到服務外購： 以孝道雙元模型解讀臺灣家庭高齡 照顧型態的當代演化

曹惟純、葉光輝

摘 要

本文從本土心理學角度對原用以批判臺灣高齡照顧商品化趨勢的「孝道外包」概念進行正向解讀，並以兼具本土契合性與實徵證據支持的「孝道雙元模型」作為理論工具，分析高齡社會下的家庭系統如何融入外部照護服務、轉化親子代間連結，形成可兼顧老年父母福祉與整體照顧關係品質的高齡照顧實踐型態。為扭轉孝道外包用語可能隱含的負面標籤，本文先根據臺灣人口變遷與社會文化脈絡重新界定本土高齡照顧議題之特性，並以「孝道服務外購」取代「孝道外包」概念，由下列面向探討正式與非正式支持系統之正向連結：(1) 提出關係導向式高齡照顧概念架構，對外部服務進入家庭後的高齡照顧本質做正面解讀。(2) 提出從「家庭角色階層主導的奉養責任關係」到「奠基於信任與協商的相互支持關係」的轉化重點，對高齡照顧服務外購趨勢下的代間連結做正面解讀。此外，亦針對孝道在家庭系統因應高齡照顧挑戰歷程中可能扮演的角色，及其對關係導向照顧、代間關係轉化的促進作用加以探討。

關鍵詞：高齡照顧服務、雙元孝道信念、照顧關係、家庭代間連結、正式與非正式支持系統

一、高齡化趨勢下的臺灣老人照顧： 從全球現象到本土議題

人口結構高齡化是過去三十年間持續不衰的一股全球變遷趨勢，更已成為當前備受世界各國關注的重要政策議題。自 1982 年聯合國首度召開「世界老化問題大會」(The First World Assembly on Ageing) 以來，許多重要的國際組織皆陸續提出各種有助於提升高齡者福祉的政策方針，諸如世界衛生組織提出的活躍老化 (active ageing; WHO 2002)、經濟合作發展組織 (OECD) 提出的健康老化 (healthy ageing; Oxley 2009)，及歐盟提出的社會排除 (social exclusion) 概念在高齡者生活福祉上的應用 (如 Eurofound 2010; Jehoel-Gijsbers & Vrooman 2008)；這些概念不僅影響了全球高齡化議題的形成與探討方向，也成為各國發展老人政策時的主要參考架構。高齡化看似跨文化的全球現象，但各國的高齡化趨勢不僅在發展背景上存在差異，其可能衍生出的社會問題及因應方式更與當地文化脈絡密切關聯。以往高齡化常被視為已發展國家在人口結構上的附帶改變，未必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但隨著多數國家相繼進入現代化歷程，個人平均壽命延長、出生率衰退等反映社會轉型的重要指標，也陸續成為全球人口高齡化趨勢的共通成因；然而，近期全球金融風暴引發的長期經濟不景氣，以及為數眾多的嬰兒潮世代即將進入老年期 (Bloom, Boersch-Supan, McGee, & Seike 2011)，不僅對歐美已發展國家的老人福利體系運作造成龐大財政壓力，並促使發展中國家提早面臨人口老化的衝擊。此外，人口高齡化牽涉層面廣泛，即使社會發展程度相近的國家，其高齡化問題的性質與解決方向仍可能隨著政策制度、文化價值等脈絡因素的影響，各自呈現出不同的本土化特色。近來，探討高齡化相關議題的跨國比較研究日益增加 (如 Estévez-Abe & Kim 2013; Jehoel-Gijsbers & Vrooman 2008; Lowenstein & Daatland 2006 等)，如何從本土社會文化脈絡促進對在地高齡化問題的理解及相關政策的制訂也受到更多探討。

(一) 臺灣人口變遷特色與高齡化核心議題

早在 1993 年臺灣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的比例就已超過 7%，成為聯合國定義的「高齡化社會」(Ageing Society)，迄今臺灣人口老化速度仍未減緩，根據行政院經建會 (2012) 推估，臺灣老年人口比例將於 2018 年超過 14%，進入「高齡社會」(Aged Society)，在 2026 年更將達到老年人口超過 20% 的「超高齡社會」(Super Aged Society)。與歐美各國相較，臺灣不僅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同樣面臨「未富先老」的特殊發展困境，且僅歷時 25 年就由「高齡化社會」進入「高齡社會」，遠甚於歐美已開發國家 (如法國需時 126 年、瑞典 84 年、美國 71 年、英國 46 年、德國 39 年) 之人口老化進程 (內政部戶政司 2013)，在高齡化因應政策的規劃與準備上更形迫切。另一方面，與其他華人社會或同屬儒家文化圈的東亞國家相較，臺灣生育率的下降速度也格外明顯。自 1997 年後，臺灣的總生育率就已逐漸接近歐美已發展國家，2003 年起更降至 1.3 人之「超低生育率」以下 (中央研究院 2011)，尤其 2007 年至 2013 年間臺灣的總生育率在世界主要國家間幾乎都是敬陪末座 (內政部統計處 2013, 2014)，導致人口結構的老化更形嚴重。單就上述人口變遷脈絡而言，已可看出臺灣高齡化問題在形成過程與問題性質上的獨特性，而出生率持續偏低造成的勞動與照顧人力不足，也反映出臺灣高齡安養照顧問題的嚴重性不容輕忽。事實上，自臺灣邁入高齡化社會以來，最早展開規劃且投入資源最多的政策回應即是逐步建構正式的老人長期照護體系，自 1998 年起陸續提出的系列政策方案包含：「加強老人安養服務方案 (1998-2007)」、「建構長期照護體系先導計畫 (2000-2003)」、「長期照護社區化計畫」(2002-2007) 等前置準備方案，以及於 2007 年起正式實施的「長期照護十年計畫」，皆不難看出老人照顧議題在臺灣高齡化研究與政策發展中的核心地位。

(二) 影響臺灣高齡安養照顧安排的社會文化脈絡

1991 年通過的「聯合國老人綱領」(United Nations Principles for Older

People) 針對「老人照顧」所提出的第一項要點即強調：「老年人應依照每個社會的文化價值體系，享有家庭和社區的照顧和保護」(United Nations 1991)。在臺灣既有的高齡安養照顧研究與政策中，本土文化價值觀的重要性雖是常被提及的理論性訴求，但在實際論述或研究架構中卻常過度簡化文化差異的影響，或僅將之列為次要考慮因素，欠缺深入完整的探討。

一般對臺灣老人安養照顧問題的文化特色說明，慣常以費孝通(1983)對東、西方家庭代間傳承模式的比較為基礎，將臺灣歸類於反映東方父子軸家庭重視親代撫育子代、子代贍養親代雙向責任的「反饋模式」；相對於西方夫妻軸家庭則呈現重視親代撫育子代責任的單向「接力模式」，較容易促成老年父母贍養責任轉移到社會福利制度的運作，因而孝道價值或家庭養老功能的運作即成為臺灣老人照顧最明顯的本土特色。在此前提脈絡下，現代家庭往往因其養老功能弱化而被視為臺灣高齡化問題的根源，目前相關政策與試行方案中雖宣示「建構家庭照顧者服務體系」為方向之一，但若以實際執行的重心而言，仍以歐美國家經驗為參考，致力於推動老人年金與完整的社會福利制度，企圖以社會／制度養老來解決現代家庭養老的困境。然而，西方福利國家其實也同樣重視家庭的養老責任，例如美國目前已有三十州透過法令明訂家庭(成年子女)對老人的照顧責任，而加拿大所有省分也都將成年子女對其父母的代間支持納入法令規範(Ting & Woo 2009)。而且制度養老的運作在歐美福利國家同樣有其困境(TrippeI, Kulikov, Davidov, & Groth 2011)，未必是解決現代高齡化問題的萬靈丹。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就曾針對新、馬、臺、港、日、韓等亞洲國家的家庭養老機制進行深入分析，以作為其高齡政策發展的借鏡(見Doling, Finer & Maltby 2005)。儘管臺灣長期以來主要由家庭負擔養老功能，但單從制度養老、家庭養老的對立區隔，既難以完全說明臺灣老人安養照顧的文化特色，對思考臺灣高齡化老人照顧因應策略的助益也相當有限。

若進一步分析支撐家庭養老功能的孝道運作則可發現，相對於其他東亞國家或華人社會，臺灣對孝道價值始終保持高度重視。首先，從老人居住照顧安排的偏好來看，長期以來，「與子女同住」一直是臺灣退休老人認為最理想的

養老方式（內政部統計處 2009），即使與同屬儒家文化圈的日、韓兩國相較，臺灣老人認為與子女同住最為理想的百分比例仍居三國之冠（行政院主計處，2006）。在兩岸三地的華人社會中，臺灣民眾不僅對整體孝道信念的重視程度高於中、港兩地，也更重視孝道的情感內涵（Yeh, Yi, Tsao, & Wan 2013），突顯出臺灣民眾對孝道的高度認同與其日常生活中的代間互動經驗緊密連結，而非只是將孝道視為具社會約束力的傳統規範。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歷年資料的分析結果也顯示：無論與自由、民主等「現代價值」相比較，或與其他同屬傳統家庭價值的項目相較（如服從長上、養兒防老），孝順父母始終都是臺灣民眾高度認同的核心價值（黃曬莉、朱瑞玲 2011）。但孝道在當代臺灣社會中獨特的重要性與運作特色，經常受到忽略或低估，而被簡化為東亞儒家文化同一性的展現，導致臺灣核心的文化價值體系與高齡政策走向之間始終存在落差。衛生福利部針對長期照護選擇的分析指出：臺灣長期照護政策目前以「機構照護服務」為主要推廣目標的做法，由於未能兼顧民眾在養老方式上的多元需求與期待，使機構照護資源呈現分布不均及供過於求的困境狀態；而實際上 65 歲以上民眾對老人生活的期待仍是以身體健康（37%）及能與家人團圓和樂（30%）的生活佔最多數（衛生福利部 2014），上述這些現象透露出在欠缺整合性政策方向及對本土文化脈絡的考量下，貿然採取西方既有政策與經驗，反而可能造成資源浪費及增加民眾的不滿。換言之，與子女同住的文化偏好應是臺灣社會規劃機構養老或社區照護系統時必須正視的前提，若一味將孝道文化視為阻礙機構照護服務發展的過時觀念或絆腳石，未必能有效解決實際問題。

在高齡化趨勢下，臺灣民眾對於奉養、照顧年老父母確實感受到越來越多的壓力，並希望政府能分擔更多的責任。然而，這並不代表家庭或子女希望完全退出老年父母的生活照顧，根據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五期二次的執行結果報告（傅仰止、張晉芬 2007）指出：多數民眾仍認為應由政府與家庭共同分攤老人的醫療照護（佔 63.5%）、生活需求（佔 45.5%）責任。即使該次調查雖約有 20.5%、11.5% 的民眾分別認為老人的醫療照護、生活需求應由政府負責（人數比例之計算同時包含填答「都是政府的責任」、「大部分是政府的責任」

者)，但在民眾的觀念中，政府對老人安養照護責任的承擔主要仍是以經濟層面的福利補助為主要形式；因此，期待政府為老人的生活照護需求負責，並不同家庭代間支持關係的斷裂或消失。以亞洲國家最早進入高齡社會的日本為例，即使日本已建立起完善的老人年金制度，但轉換為社會養老模式後，仍有半數家庭保有親自照顧家中高齡長者的意願，其政策方向也漸由發展「機構照護」轉向推動「居家照護社會化」（李光廷 2001），顯見家庭在老人安養照護上仍有不同於社會福利體系的功能與重要性。

整體而言，臺灣社會目前面臨由「家庭養老」過渡到「家庭與政府共同分擔養老責任」的狀態，一般民眾不僅對孝道仍維持高度重視，且偏向認同孝道運作所蘊含的代間情感互動，日常生活結合，這些都是理解臺灣高齡安養照顧相關議題時不可或缺的重要文化脈絡。即使要以其他國家的高齡化因應經驗作為參考，也必須兼顧東、西方文化差異特徵，才能真正掌握歐美、東亞甚至其他華人社會的政策經驗核心，並將之轉化成為具本土契合性的實踐形式。

（三）臺灣老人照顧需求因應現況與議題定位

在既存的家庭養老文化及現代民眾對代間情感的重視下，目前臺灣老人安養與照護責任仍以家庭為中心，一般退休老人的生活費用或照護需求，主要仍由成年子女負責。自 1989 至 2009 年間歷次全國老人狀況調查結果皆一致顯示，65 歲以上退休人口的生活費用皆以成年子女為主要來源（內政部 2001, 2005, 2006, 2010），即使在的最新一期的調查中，退休老人的主要經濟來源也仍以子女奉養的比例最高（衛生福利部 2014）。至於老人照顧需求部分，西方福利政策研究所界定的老人照顧往往以各類失能老人的生活照護需求為主，但在臺灣社會中，老人照顧經常被納入「安養議題」中共同討論，較少區隔一般生活照顧與針對失能者的照護，並習慣以「是否與子女同住」作為衡量老人安養照護需求是否得到滿足的全包式指標（伊慶春、陳玉華 1998），因為在孝道文化運作下，與子女同住不僅是一種居住安排形式，更同時隱含了子女在經濟／物質、家務、情感、個人事務（如疾病照顧）等生活面向上提供的整體支

持，以及對代間互依關係的強化。無論在內政部歷年的老人狀況調查報告，或最新一期由衛生福利部執行的調查結果中，65 歲以上退休老人的居住狀況一直都以「與子女同住（含兩代家庭與三代家庭）」居多，迄今仍有超過六成的退休老人與子女同住（衛生福利部 2014），顯見全面涵括日常生活與醫療照護需求的家庭養老模式在臺灣仍有相當重要性。在此考量下，本文所探討的老人照顧，將以臺灣家庭在高齡社會養老脈絡下一般老人的整體生活照顧為主，而非單純基於醫療化的評估標準將老人的照顧需求集中於「失能協助」，後續的論述分析也將配合行文的流暢性，交互使用「老人或高齡照顧」用詞來表示。

儘管臺灣的老人照顧看似由家庭中的成年子女共同負擔，但家庭照顧責任原就長期呈現以女性為主的高度性別化狀態，再加上臺灣家庭以父子軸為優先的運作特徵，家中老人的主要照顧者往往以媳婦居多。只是隨著生育率下降、女性就業率提高，可共同分擔老人長期照顧的女性家庭成員相對減少許多；然而，由於個人平均壽命增加及醫療科技水準大幅進展，當代老人逐漸延長的晚年階段，多少必須同時面對自然老化與長期慢性疾病的雙重影響，致使老人照顧的整體需求不僅隨著人口高齡化而呈現量的成長，照顧需求內容在性質上也更加多樣化，難以單由女性家庭成員或媳婦負責家中老人的長期照顧。因此，如何透過福利體系提供滿足家庭需求更充足的正式照護服務、資源，成為臺灣老人照顧政策發展的重點。在臺灣長期照顧體系的發展進程中，政府的確已陸續規劃或開放更多樣化的老人照顧服務或資源，以因應家庭照顧人力的缺乏。可是，臺灣目前的政策設計並非以政府作為相關福利服務的直接供給者，而是基於歐美各國的福利發展與改革經驗，呈現「福利混合經濟」的特色（謝儒賢 2006），亦即政府為了節省財政成本，採取民營化模式，結合包含志願部門（非營利組織）與商業部門等不同性質的民間單位共同提供多元化的老人照顧服務（陳燕禎 2008）。在此種政策發展基礎下，臺灣現行的老人照顧服務性質與一般民眾想像中由政府提供的免費福利資源並不相同，其中較具機動性的服務內容常以部分補助的形式運作（如喘息服務或居家服務設有每月免費使用時數之補助），亦有不少服務已朝完全商業化發展（如機構照護床位長期租用、外

籍看護的聘僱），以讓服務使用者在市場機制中有更多選擇。在福利服務逐漸民營化或商業化的過程中，政府的主要功能也陸續轉變成為如何協調資源的有效供給（古允文 1997）。因此，目前臺灣老人照顧的相關政策目標或研究也以整合各部門資源、建構完整而有效率的福利資源與服務輸送體系為焦點，相對而言，老人照顧需求內容、滿足方式的文化考量，以及家庭系統原本的運作特徵等，在政策發展中甚少受到關注。臺灣目前的老人照顧政策看似符合一般民眾期待，朝著由家庭與政府共同分擔老人照顧責任的方向發展，然而服務提供的實質運作卻以市場機制相緊密結合。來自政府、志願團體、商業機構等部門的老人照顧服務相關工作者一致認為，目前臺灣老人安養照護服務本質究竟是「社會福利事業」或「照顧服務產業」，難以找到清楚定位（謝儒賢 2006）。因此，正式（政府與商業市場）與非正式（家庭）老人支持系統之間能否達成良好配合將是提升老人照顧品質及福祉的重要關鍵。

已有不少研究指出老人照顧的市場化或商品化是不可避免的趨勢（藍佩嘉 2004; 張國偉 2008），甚至與成年子女同住也未必等同老人的所有需求完全得到滿足（陳正芬 2009），唯有適時從家庭之外引進其他照顧人力或服務（如送餐服務、接送服務等）的協助，才能妥善因應老人的生活照顧需求。針對高齡人口建構合適的福利制度與產業化的長期照護服務體系有其必要性，然考量目前臺灣正式照顧福利體系中，政府、志願團體、商業機構各部門的責任歸屬與角色定位混淆不清的問題（陳燕禎 2008; 謝儒賢 2006），家庭仍然是唯一較可能以老人實質照顧需求、偏好與福祉為優先關注的重要保護機制。儘管在完整的社會福利服務部門理論架構中，隸屬於非正式部門的家庭，原就與正式系統中的政府、志願團體與商業機構三個部門同樣扮演福利提供者角色（黃源協 2000），且臺灣迄今仍是由家庭擔負主要的老人安養責任，但在老人照顧政策研究或議題操作上，家庭的角色卻較為扁平次要，類似只是被動的「服務使用者」。在臺灣當前正式與非正式老人支持系統的合作脈絡下，由子女親自照顧與付費使用照顧服務並無絕對的優劣之分，使用照顧服務或福利資源也未必等同於家庭養老功能弱化，無論面對各種安養照護需求挑戰或相關政策方向調

整，家庭始終才是彙整不同層面照顧資源、轉化出各種可行的老人照顧型態的實作場域。因此，在理解任何一種高齡照顧方式或現象的意涵時，都應避免直接以「子女親自照顧」作為比較基準，而需進一步探索各種照顧實踐背後的家庭運作歷程，以及老人本身的需求是否得到滿足，才不致過度簡化文化因素的作用效果而形成偏誤。

二、由外包孝道現象發展臺灣本土高齡照顧研究架構： 多元層面的「跨·文化」關注

(一) 臺灣高齡照顧研究的主要取向

臺灣雖早已進入高齡化社會，但在高齡化研究上卻長期欠缺有系統的探討，且過度倚重西方既有的理論或研究成果（Lu 2012）。就臺灣目前的高齡照顧需求因應研究主題而論，大致可區分出兩種方向：其一是探討各種老人安養照護相關政策的規劃發展與正式照護服務的使用狀況，主要以社會工作與福利政策相關領域之研究居多，通常引介基於歐美經驗所發展的福利概念、理論作為分析依據。另一方向則從家庭對老人的支持網絡與功能進行探討，此研究取向雖然涉及家庭運作的探討，但切入角度仍以社會學、人口學或經濟學為主，著重探討非正式支持網絡的具體結構、影響家庭代間支持功能的結構背景因素，其中最廣受引用的代間連帶理論（Bengtson & Roberts 1991）同樣也是西方理論；即使有些研究在探討臺灣家庭的老人支持功能時會將華人孝道納入考量，卻甚少在本土文化脈絡下深入分析孝道運作的意涵與機制，僅將之用於與西方的交換理論對比，以強調華人孝道在現代社會中的重要性不若以往（如張桂霖、張金鶚 2010）。以上兩種探討取向皆較少考慮本土文化價值對老人照顧議題本身的影響，且兩者之間少有交集，導致對高齡照顧研究的數量雖多，但研究的具體成果則難以持續累積、進展。

在臺灣除了劉欣怡（2007）曾以護理人類學角度，針對蘭嶼達悟族老人照

護關係進行民族誌研究，幾乎沒有研究以文化為核心或直接探討文化差異對老人照顧本質的影響。劉欣怡（2007）的研究批判從漢人角度界定老人照護需求的偏誤，深入分析達悟文化為何認定照顧老人的責任必須由親生子女及配偶承擔，而將居家服務提供的護理與照顧視為禁忌行為，該研究結果雖可突顯出達悟老人在照護責任的認定方式與政府所推廣居家照顧服務難以相容，卻未能對如何在當地青壯人口外流現狀下以完全契合當地文化的方式補足照顧人力，提出進一步的具體建議。在過往探討家庭代間支持行為的研究中，本文作者之一曾提出，孝道在華人社會與家庭文化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其統攝由「輩分－年齡－性別」所形成的家庭階層結構，是支撐華人家庭功能運作之基礎，不宜將之歸類為西方代間連帶理論中隸屬於規範連帶的某個次成分，並建議應以華人孝道信念來整合其他結構連帶、關聯連帶對家庭代間支持功能的影響（葉光輝 2009b）。然而，目前臺灣老人家庭照顧相關研究，其實多半只將孝道視為影響力逐漸減少的特殊文化價值因素，在概念界定上不夠深入嚴謹，也無意探究華人孝道在各類家人關係上的實質運作，而只是習慣性地將孝道式微與許多具爭議性的新興家庭現象（如啃老族、孝道外包）連結，忽略了華人孝道對於解決這些現象背後具體問題成因的可能助益。從上述兩個說明例子可知，在老人照顧需求議題的探討上，對文化或本土化的關注或許可以得到有意義的研究發現，但這些發現卻經常難以在實務上發揮應有的影響，若要改善此問題，實有必要重新思考研究議題整體脈絡的設定。

整體而言，目前臺灣高齡照護需求的問題重點已轉移到家庭與政府如何共同分攤責任，唯有同時考慮正式與非正式照顧體系兩者運作的相互配合，才能有效提升高齡者的需求滿足與照顧品質。雖然曾有少數研究由正式（福利資源或外部提供之照顧服務）與非正式（親友）支持系統的連結探討如何提升老人照護需求的滿足（如呂寶靜 2005），但多半仍從福利輸送的角度出發，將原本的家庭照顧者（而非老人）視為照護服務的使用者，據以探討家庭支持網絡結構對於長期照護服務使用選擇的影響，較少從文化與民眾心理運作的角度切入，從老人與不同家庭成員的互動特徵與家庭整體動力運作，來瞭解外部照護

服務如何融入家庭代間照顧關係的歷程。迄今有關福利資源輸送與家庭支持系統運作的整合仍相當有限，這是由於一般從個體心理或家庭代間運作歷程探討家庭互動的研究者甚少將討論範疇擴及外部正式資源，而政策／福利取向之學者雖將家庭（非正式）支持系統共同納入考量（如呂寶靜 2005），強調從結構面探討家庭支持網絡的人數、成員，及其在支持功能上可能出現的分工模式，但並非從文化與心理運作的角度來瞭解老人與不同家庭成員的互動特徵，以及家庭整體動力運作對照顧分工的協調與整合歷程。至於整合正式與非正式老人支持系統的關聯，目前也僅止於檢視非正式支持網絡結構因素對既存的正式服務資源使用程度的影響，較少從使用者（老人本身及家庭照顧成員）經驗的角度去檢視服務落實到家庭系統中的運作特性（葉光輝 2014）。因此，如何強化「正式的社福資源或服務」、「家庭代間運作的整體互動協調歷程」、與「高齡者對需求滿足方式的期待」三者間的相互配合，將是確保高齡族群福祉且避免資源浪費的關鍵，也是本文的探究重點。

（二）由臺灣高齡照顧需求研究脈絡反思外包孝道的概念緣起與內涵拓展

正式與非正式老人支持系統的連結尚未受到高齡照顧研究關注的可能原因，除了研究主題本身已涉及福利輸送制度與家庭功能運作兩種領域，它們並不容易進行整合外，更直接的問題則是欠缺合適的議題與理論架構對兩套系統的實際互動與配合進行深入探討。為了在探討正式與非正式老人支持系統的連結時能以高齡者本身與家庭的整體需求為核心，有必要先理解臺灣在照顧服務運用上的文化偏好與現狀。從實際的統計數據來看，目前臺灣在老人長期照顧服務使用上偏好選擇外籍監護工（林明禎 2011）。儘管相對於新加坡、香港等其他華人社會，臺灣政府對僱用外籍看護工的條件訂定嚴格規範，但近二十年來，臺灣家庭僱用的外籍看護之數量仍持續成長（同上引）。與同屬東亞儒家社會的日、韓兩國相較，臺灣老人不僅在聘僱外籍看護工的人數與比例高居三國之冠，而且相對於日、韓在外籍看護選擇上是以語言文化互通的族群為主

(如日裔巴西人、中國朝鮮族)，臺灣則大量聘僱來自異文化的東南亞移工作為老人家庭照顧的代理人 (Estévez-Abe & Kim 2013)。此種以聘僱外籍看護工來因應照顧人力不足的趨勢日漸受到關注與討論，並有學者以「孝道外包」的概念加以描述 (Lan 2002)。

外包孝道 (subcontracting filial piety) 概念原是用於描述「臺灣成年人將照護年長雙親的孝道責任轉移給非家人的受雇照護者」，且主要針對僱用外籍看護工擔任孝親實作代理人與虛擬親人之現象進行探討 (Lan 2002; 藍佩嘉 2010)。與其他類型的照顧服務相較，外籍看護工已是高度商業化的服務，幾乎已不帶有任何社會福利性質。儘管此種將子女照顧責任透過商業行為轉移給外人的做法常被貼上負面標籤，例如：商業化服務仍無法取代子女親自照顧的品質；但有學者仍認為，在文化脈絡因素（華人重視家庭與孝道），以及政策脈絡因素（居家照護服務在使用對象與時數上的限制）的雙重影響下，外籍看護工是照顧者與被照顧者雙方在照顧責任與需求滿足之間唯一可能取得平衡的選項，甚至將之稱為「最符合臺灣孝道傳統的在地老化服務模式」（陳正芬 2011）。由此已可約略看出，外包孝道現象所反映的家庭運作與商業照顧服務的緊密結合，相當適合作為連結正式與非正式老人支持系統的基本脈絡。

然而，自孝道外包概念提出以來，多數相關研究都以批判此種勞雇關係中結合性別與種族剝削的權力運作為主，少數對孝道外包功能的正向探討，則主要集中於它能減輕照顧提供者（成年子女）的壓力，例如：子女可維持三代同堂的孝道理念，而無須直接負擔實際照護父母的工作，或使原本為主要照顧者的媳婦能透過此種方式掙脫父系家庭權威的束縛（陳正芬 2015; 藍佩嘉 2010）。但此種減輕照顧壓力、父權束縛的功能面向往往也是外包孝道被批判的重點，即照顧責任經由兒子轉移給媳婦（性別移轉），再經由媳婦轉移給非家人的受雇者（市場移轉），亦即此種轉包鍊形式使孝親實踐與老人照護皆被商品化，且持續加深家務照顧勞動的性別化（藍佩嘉 2010）。雖然孝道外包概念的提出者曾特別強調，外包孝道的運作具有讓家庭協商、重構照護意義的功能，未必會破壞家人間的親密關係或照顧品質（藍佩嘉 2010），但相關的實徵

研究仍相當有限，例如曾有研究以美籍臺灣移民家庭在福利資源運用與代間經濟交換的整體運作關係來分析，說明照顧的市場化並未弱化家庭親密關係之連結（藍佩嘉 2010），或由家中主要照顧者（成年子女）的角度瞭解僱用外籍看護對家庭照顧關係的正向影響（曹毓珊 2002）。不過，現有研究多以子女角度為主，且採質化取向進行，欠缺較大量化實徵結果的證據來支持：外部照顧資源的引入確實可提升高齡者的需求滿足與福祉，並促進整體代間關係品質。因此，若要有系統探討外包孝道的運作如何達成老人照顧需求滿足、增進照顧關係與品質，甚至外籍看護工與家庭系統的融入等正面功能，仍需要發展合適的理論架構。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採取聘僱全職幫傭／外籍看護，或選擇以機構養老方式安置父母生活，都不表示子女僅止於支付承包對象的薪資，而完全不涉入照顧行為；至於其他類型的照顧服務（如居家照護服務、日間照護）多是計時性質，更突顯出家庭支持系統與正式服務系統間需要相互配合。國內近期研究顯示：一般家庭對各類老人照顧服務使用漸行普遍，甚至可能與不同的家庭照顧運作模式相結合，例如由老年配偶與成年子女共同運用外部老人照護服務（吳宜姍 2006），以及多重照護服務資源（如鍾雨恩 2011）；此外，越來越多的政策評估研究也提出，必須將一般家庭中常見的輕度失能或行動緩慢老人的家庭照顧需求也納入考量（林明禎 2011），並認為針對老人未滿足需求規劃適切的居家支持體系，彌補老人照顧需求與家庭照顧間的落差，將是臺灣長照政策的主要課題（陳正芬 2009）。因此，儘管外包孝道概念原本的命名與探討焦點，較著重於孝道責任在商業機制中的成套轉包與層層轉包，但若從較廣義的角度，將孝道外包現象的內涵理解為如何使用外部照護服務或資源來提升對老人照護需求的滿足，亦即以老人照顧工作的外部化（outsourcing）重新來界定孝道外包，如此一則可將各種不同類型的照護服務納入探討，二則可探討家庭代間運作如何與外部照護服務相互融入，繼而促進老人照顧品質與整體照顧關係。上述對於外包孝道概念內涵的擴充，不僅可使外包孝道研究方向朝正面發展，也使其有機會成為探討臺灣正式與非正式老人支持系統相互連結的基本脈

絡，為臺灣本土的高齡照顧研究累積更多有意義且具整合性的成果。

(三) 本文分析架構與理論工具

不同於將孝道外包現象視同家庭老人將照顧責任外包出去的字面解讀，本文基於對臺灣本土老人安養照顧安排選擇與現況的社會文化脈絡分析，將外包孝道轉化解讀為正式支持（來自政府或商業部門）與非正式支持（家庭代間照顧）之間的連結，強調兩支持系統在家庭場域中的相互融入與協力運作，並採用孝道服務外購（outsourcing filial piety）的概念來替代，借以與孝道外包的原解讀意義相互區隔。相對於以往探討外包孝道現象的相關研究集中於社會學、社會工作與福利等領域，多從家庭與市場結構層次切入，且偏重由「照顧者」的角度探討老人照護工作的性別化與種族化（如陳正芬 2015; Lan 2002 等），本文則由本土心理學角度出發，一方面深入探討家庭系統在因應人口高齡化所衍生的照顧挑戰時，如何透過將合適的外部照顧資源或人力引進並融入家庭代間照顧關係中，形成兼顧老人、家庭與整體照顧關係的當代老人照顧實踐型態，以達成對此現象的正面解讀；另一方面也希望能藉由本文的分析，為「外包孝道」與其背後所反映的「正式與非正式老人支持系統的連結」之間提供適當的理論銜接，進而逐步發展出一套適用於論述及探討本土高齡照顧議題的分析架構。本文的基本分析架構如圖 1 所示，其中，在理論建構層次分別包含兩項正向解讀重點：一方面針對外部服務進入家庭支持系統後，老人照顧本質與內涵可能產生的變化加以探討，以達成對高齡照顧內涵的再概念化；另一方面則拓展既有研究以批判照顧工作性別化為主的探討方向，轉而分析家庭代間運作與各種外部資源相互融合的歷程，針對外包孝道趨勢下的老人照顧實踐所反映的代間連結轉化重點，及此種代間關係轉化在照顧實踐上可能展現的具體形式進行探究。上述兩個解讀方向，除了同時關注高齡父母與所有涉入照顧實踐的家內、外成員如何在照顧關係中獲得滿足，也關注如何使老年父母在代間照顧關係中的主體性得以展現。此外，由於一般研究常將孝道簡化為奉養父母的責任，或與奉養責任對應的具體規範內容（這僅是孝道雙元模型中權威性孝道

面向的部分內涵而已，葉光輝 2009a），在此種界定方式下，對外包孝道的解讀結果不外乎「認為傳統孝道的具體規範內容已隨時代變遷而式微」，或「根據研究對象或主題提出各種新的具體規範內容來定義當代社會中的（新）孝道」（如張國偉 2008；陳育伶 2013）。只是不同學者提出的新孝道規範內容不僅有所差異，也常與其所認為的「舊孝道」在理念核心上欠缺清楚區隔，要消解這些概念化上的矛盾，唯有將孝道界定為引導華人代間互動的文化心理基模，由各種具體行為或固定規範內容背後的心理運作機制來界定孝道。因此，下面有關孝道外包現象正面功能的討論與解讀，都將以孝道雙元模型作為理論基礎（葉光輝 2009a；Yeh & Bedford 2003），亦即將孝道界定為子代與父母互動時的兩類基本心理運作信念或原則（而非某些固定的具體行為規範內容）——強調個體間情感的相互性孝道（reciprocal filial piety）與強調家庭角色規範的權威性孝道（authoritarian filial piety），並透過相互性孝道的運作細節來說明，孝道信念與將父母照顧工作或服務外部化的行為實踐如何可能相互強化，進而共同達成新型態老人家庭照顧模式的展現，以突顯納入外部正式服務後的家庭照顧實踐及其所展現的代間連結轉化，及對親子雙方福祉與關係品質的增進效果，澄清一般認為照顧服務外部化雖可減輕子女照顧壓力，但並無法增進高齡父母福祉的迷思。

孝道外包現象乍看之下似乎反映了孝道價值或家庭功能的衰退，在臺灣社會討論此主題並不是典型的「跨文化」研究議題；但就議題選擇、分析方向等細節而論，它仍涉及了不同層面的「跨文化」理念，而與本次會議主旨有所呼應。首先，以往探討正式與非正式老人支持系統的連結時，慣以西方福利輸送取向為優先，家庭背景與運作脈絡則淪為影響照顧服務使用的眾多因素之一。本文選擇以臺灣本土新興的家庭現象作為基本討論脈絡，在處理正式與非正式系統的連結時，也考量臺灣不同於其他華人社會或東亞國家的特色，強調以家庭本身的正向轉化歷程為基礎，從家庭代間連結運作如何統整外部照顧服務與資源來探討老年父母照顧需求的滿足與家庭功能的展現。就老人照顧需求滿足議題的設定而言，這已同時參照了歐美福利國家、當代其他主要華人社會、東

亞儒家文化圈各國之後，對於臺灣本土高齡照顧議題的定位所達成的跨文化理解。其次，本研究是針對社會學領域提出的外包孝道概念提出本土心理學式的解讀，因而也必須不斷跨越不同學科領域在議題處理層次的「文化」差異，儘管目前的分析架構是以個體層次的孝道信念運作及代間互動為主，似乎讓原本社會學式的討論重點（如性別、勞雇關係之權力結構等）隨之隱沒，然而，分析架構中的兩大解讀方向——關係導向式老人照顧概念、代間連結轉化的具體運作，其實都相當強調以整體照顧關係為主體，而非只關注老人的需求。因此，性別、族群等因素對整體照顧關係中每位成員（無論是受雇的照顧工作者、老人、其他家庭照顧者或家庭成員），及其間各種關係組合的影響，未來也都能以不同的形式納入分析架構中加以探討。最後，本文對孝道外包現象採取正向解讀，將此種老人照顧型態的意義由傳統孝道價值式微轉變為代間情感的當代體現形式，則也屬於在社會變遷層次上跨越新／舊文化與時間的努力。傳統價值或規範的變遷在研究上一直存在新、舊價值觀之間如何清楚區隔的問題（葉光輝、章英華、曹惟純 2012），然此種新、舊對立的定義困境相當類似將東西方文化的二元對立複製到時間向度上，而唯有透過對孝道新概念化的方式才能加以改善。本文以孝道雙元模型作為分析工具，即是借助其在孝道概念化上的特點，採取由各種具體規範內容所對應的個人心理需求來定義孝道信念在個體層次的基本運作向度，如此不僅可呈現出孝道運作在正式與非正式老人支持系統相互融合歷程中所扮演的促進角色，也可避免讓孝道信念被標籤化為老人照顧服務推廣上的文化障礙。以下分就圖 1 中的兩條正向解讀途徑依序進行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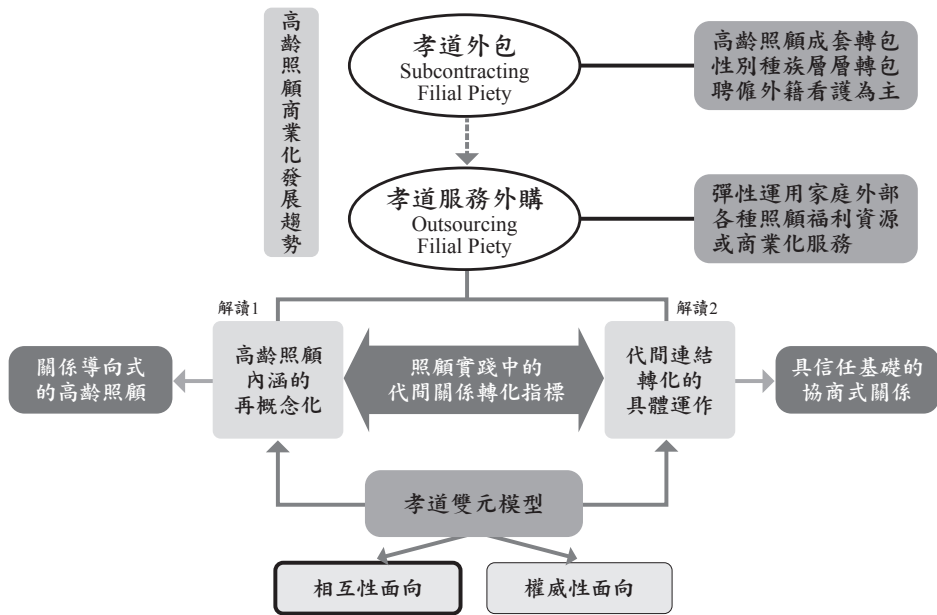


圖 1 基本分析架構示意圖

三、由外包孝道的運作反思老人照顧概念本質： 關係導向式的老人照顧

要對外包孝道在老人福祉與代間照顧關係上的運作提出正向解讀，必須先釐清在外部服務融入家庭後，老人照顧實踐內涵有何變化。過往有關老人照顧的研究多半以失能或罹患長期慢性疾病的老人為對象，集中探討照顧工作對照顧者本身的負面影響，因而偏重將照顧視為「責任、義務或消耗時間心力等屬於權威性孝道面向的勞務工作」。相關文獻通常針對特定照顧工作的內容如何被完成、誰完成、或其結果等問題著墨較多，不僅忽略了照顧行為本身仍存有偏屬於相互性孝道面向的情感表達意涵，也難以顯現出代間照顧現象中，整體家庭系統的運作、改變及發展的動態歷程，例如：照顧的責任與執行分配如何

決定、與父母的過往情感互動經驗如何影響成年子女面對年老父母的照顧需求等。由於較偏重老人家庭照顧的勞務活動性質，既有的研究典範也以「主要照顧者」為核心，多半從「照顧者的角色身分」探討其面臨的壓力與可能困境，鮮少以「照顧現象本身」作為分析和探索的方向。然而，當外部照顧服務加入後，實際的照顧勞務已有新增的人力共同分擔，且在新的照顧關係中可能衍生出其他不同於以往的照顧工作相關內容，例如協調、規劃與整合。因此，外部服務的加入，除了可能造成老人家庭照顧本質變化外，也更突顯出僅以勞務內容來界定老人照護需求的不足。

國內曾有學者從護理人類學的角度分析指出，有關老人家庭照顧本質的研究相當少見，且多以類似照顧技能或正向照顧結果的相關變項作為替代，對於如何界定有品質的照顧也欠缺共識（許敏桃 2005）。若從不同領域對（老人）照顧相關概念的實際界定或測量方式來看，現有的概念或理論多半以照顧提供者的角度（如可提供的實際支持內容、可提供支持的結構網絡）來描繪老人的照護需求及滿足。其中，社會工作與福利領域，較常使用 ADL（日常生活活動）、IADL（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動）等例行項目來評估老人的照顧需求，並以此套架構規劃其所提供的正式照顧服務內容。而從家庭支持系統角度切入者，則較側重在非正式體系中家庭、親友等各網絡成員所提供的各式支持或協助內容，例如以情緒支持、金錢支持、家務與照顧支持（工具性支持、資訊性支持）等有關代間支持的分類；或者親友間可能形成的支持網絡結構，例如臺灣人口學者根據本土社會脈絡提出的戶基護航網絡（陳肇男、林惠玲 2015）。至於在護理領域，雖然多數學者仍認為，即使從疾病治療與護理的角度來剖析，「照顧」（caring）概念也不只是「投注時間」或「提供協助」而已，更包含了「情感」、「互動」（Morse, Bottorff, Neander, & Solberg 1991）、「用心（serious attention）」、「關懷」、「尊重」（McCance, McKenna, & Boore 1997）等核心面向。不過在護理領域實際的概念界定與實徵研究的變項操作中，往往還是將照顧切割為：（護理）專業知識技能、資源提供、人際特質或溝通技巧等部分，對於照顧概念在情感面向的實踐方式多半僅止於理論性的陳述。

多數性別研究或家庭社會學角度的學者都對「照顧工作的情感化」提出強烈批判，認為此種論述角度有助於合理化女性的家庭照顧勞動責任，使男性負責照顧安排決策、女性負責執行照顧勞務的性別分工繼續維持運作（藍佩嘉 2010）。然而，某些非勞務性的照顧活動（如規劃安排、溝通協調、陪伴等），其實同樣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心力，未必比執行照顧勞務本身輕鬆，尤其在外部照顧服務進入家庭後，需要規劃協調的內容也更為繁複。根據一般接受照顧者的意見，「好的照顧」必須能展現以下特徵：非例行公事式的行為表現、能提供必要資訊使受照顧者放心、關注個別差異與文化偏好，讓受照顧者在過程中感受到尊重等（Finfgeld-Connett 2008）；上述所列舉的特徵，幾乎都必須透過照顧關係中良好的溝通協調及規劃才能達成，可見非勞務性的照顧內容同樣有其重要性，甚至可讓照顧勞務的執行更為順利。此外，家人之間情感互動與陪伴不僅是照顧的表現之一，對照顧者本身而言，這些行為本身亦同時具有消解壓力與倦怠的功能（Brown et al. 2009），因此，探討照顧動機的情感面未必只會帶來老人照顧工作性別化的負面後果，也可能對照顧者本身有所助益。上述提及的各類非勞務活動內容往往被排除在「照顧行為／需求」的探討範圍之外，因而孝道外包現象容易因為將照顧勞務委由他人執行而被誤解為「子女不再承擔照顧責任」。

另一方面，老年期原就是個人生命週期中特殊的發展階段，在面臨人生接近終點的過程中，其社會心理的發展需求將集中於情緒／情感與靈性面向上，例如統整過往各種重要生命事件、尋求人生的意義（Erikson 1982）；比起向外尋求更多新的人際經驗或社會關係，老人期的社會心理發展傾向將心力資源投注在少數具有重要意義的情感關係上（Carstensen, Isaacowitz, & Charles 1999），並透過這些可提供情緒支持的親密關係，統整個人一生的經歷、從中尋求生命意義；其中，又以來自家庭代間關係（子女、孫子女等）的互動、關懷，對老人晚年的發展適應助益最多。然而，此類融合親子關係發展過程中深刻回憶與體驗的深度情感互動，在一般對老人家庭照顧內涵的界定中同樣付之闕如。此外，即使從護理的角度來看，老人照護的特色往往並非以疾病的治

癒為目標，而是需要長期的生活照顧與陪伴（Nolan, Brown, Davies, Nolan, & Keady 2006），在此前提之下，穩定、熟悉且溝通良好的照顧關係同樣有助於老人的生活適應與照顧品質。

隨著社會高齡化的發展趨勢，未來臺灣老人的照顧模式將逐漸朝由家庭非正式支持與外部正式服務相互協力的照顧模式發展，在此種照顧型態轉變歷程中，原本家庭中的代間照顧支持關係並未消失，而是有各種不同性質的外部照顧者可能加入，整體照顧關係的運作更為複雜。傳統聚焦於受照顧者的個人中心式照顧理念，在這種老人照顧模式發展趨勢下的執行將有其困難，例如在傳統的華人家庭照顧中，參與照顧的家庭成員間在醫療決策或照顧執行上已常出現意見不一致甚或衝突，若參與照顧的成員數量、性質與可能形成的關係組合皆有所增加，儘管每位照顧者均以老人的福祉與需求為核心，但彼此對於照顧的想法或做法仍可能出現差異而造成衝突。因此，唯有兼顧且訴諸所有涉入成員間的共識與關係和諧，才能確保老人照顧的品質。換言之，關係導向式的老人照顧不僅涵蓋個人導向式照顧所欲強調的老人福祉優先性，且能同時兼及有助於維持老人照顧品質之整體照顧互動關係。再就照顧理念本身而論，Nolan 等人（Nolan, Davies, Brown, Keady, & Nolan 2004）曾由老人護理的角度指出：目前學術研究中強調以個人為中心的照顧理念，本質上皆以個人主義為運作基礎，重視如何讓高齡者在生活功能上保持獨立自主，雖和「成功老化」（successful ageing）、「生產性老化」（productive ageing）等英雄氣概式（heroic model）的主流老化概念密切關聯，但與老人期的身心發展趨勢存在差距，也不利於高齡者的老化適應；亦有學者認為過度強調獨立自主可能流於以青年本位主義的心態或價值標準來界定老人福祉，反而容易造成隱形的年齡歧視（Plath 2008）；因此，既能讓老人自在接受照顧又同時維持其自我價值感的互依式關係，才是真正能契合高齡者需求的照顧關係（Nolan et al. 2004; Plath 2008）。

事實上，自主與關係連結（relatedness）皆是人類的基本心理需求，兩者原本就並不互斥（Deci & Ryan 2000），關係導向式的老人照顧概念是以「照顧實踐中的整體關係運作」取代「照顧者／被照顧者」的角色切割，因此，在

傳統照顧概念界定下，老人較類似被動接受者，而在關係導向式照顧概念架構中，老人則是隸屬於整體照顧關係的成員之一，與其他成員彼此可經常就照顧關係的運作交換資訊、表達感受，共同為提升照護關係中每位成員的需求而努力。以往研究在探討正式與非正式老人支持系統的關聯時，多半聚焦於各種可能的分工模式（張宏哲 2010），然而，各種分工類型的判斷重點常被簡化為家庭系統與外部服務兩個主要單位，且僅關注特定照顧工作是否有人負責、由誰負責，未必能反映出真正的分工品質及提升老人福祉；相對而言，關係導向式老人照顧則（1）更重視所有涉入成員皆能充分瞭解整體照顧內容、彼此的狀態，（2）形成彈性化的相互支援與資訊交換，而非對照顧內容與責任進行固定而清楚的切割。不少研究（Herdman 2002; Mckinlay & Cowan 2003）指出，對照顧老人工作的低評價，並非源自於對老人本身持有負面觀感，其最主要是來自於工作環境的氣氛不佳所造成。因此，要營造出能讓所有成員主動持續投入的整體照顧關係，必須以照顧關係為主體，並兼顧不同成員在照顧人際歷程中對自身角色意義的尋求。Nolan 等人（2004, 2006）曾提出一套包含六個向度的照顧感受架構（senses framework），例如安全感、隸屬感、持續感（sense of continuity）、目標感（sense of purpose）、成就／效能感、重要感／價值感（sense of significance）等，並強調有品質的老人照護，應同時關注包含被照顧者（老人）、家人照顧者、非家人照顧者（如專業護理人員、看護工或志工等）等角色在上述六種感受向度上的不同需求。

最後，本文以外部服務融入家庭的歷程作為探討孝道外購的基本脈絡，而關係導向式老人照顧的理念仍以家庭代間關係為基礎，且可能由華人孝道的運作原則加以帶動。曾有學者提出「重老的社會才會重孝」（楊國樞、葉光輝 1991），孝道雖然常被視為合理化父母優勢地位此屬於權威性面向的文化設計，但其運作機制其實也包含了對高齡者心理需求的理解與重視此屬於相互性面向的內涵。根據孝道雙元模型的觀點，相互性孝道原本就可視為反映親子關係情感親密程度的指標，過往研究亦發現相互性孝道與個人的同理心有高度相關（Yeh & Bedford 2003），因此相互性孝道信念高的子女，較容易以原本良好

的親子關係為基礎，並透過自身善於溝通的人際互動特質，營造出讓非家人照顧者能真正融入的照顧關係。而對於非家庭成員的居家照顧工作者或專業照顧工作者而言，其亦可透過自身的孝道信念達成對照顧工作的認同，以類親屬、虛擬親人的角色融入服務的家庭（Wang 2002）。以往研究也發現相互性孝道可增進子女對父母的情緒與情感支持行為（葉光輝 2009b），其他集體主義社會的研究更以相互性孝道來說明，子女與老年喪偶母親如何透過回憶以往的互動經驗、感激母親以往的付出等代間情感運作，共同達成對「照顧者－被照顧者」角色反轉的正向調適（Mottram & Hortacsu 2005）。這些實徵證據一致顯示：子女的相互性孝道將有助於滿足親子雙方在照顧關係中的情感連結需求、個人角色意義需求。此外，相互性孝道也有助於老年父母與子女照顧者之間的互依關係，Chan 等人（2012）的研究即發現：在孝道運作所形成的代間互依關係中，即便是臥病在床的老年父母，同樣可透過給予家庭成員情感關懷，減低照顧者的負擔，並讓照顧者從照顧關係中找到自我價值。

綜合上述，要探討外購式照顧服務融入家庭代間照顧關係的歷程及相互協力運作型態，必須透過關係導向式照顧理念，擴展照顧概念所涵蓋的不同層次、面向，尤其是補充情感支持、資訊交換與溝通、互依關係的營造等非勞務性質的面向，而非侷限於「主要照顧者／被照顧者」的分析架構下，將各種細微的照顧內容全數化約為子女日常照顧勞務，偏於強調家庭角色義務屬權威性孝道面向的工作。而考量關係導向式老人照顧概念的界定方式與以往的照顧概念差異極大，因此僅先就理論層次提出初步的概念內涵論述，希望能對其概念化的方式或特色提出完整、具體的說明。而孝道外包看似孝道價值式微造成的結果，但若參照孝道雙元理論模型進行分析則可發現：此種外包照顧型態能否呼應關係導向老人照顧的訴求，使外部服務能與代間支持融合成整體照顧關係、發揮出真正功能，仍奠基於相互性孝道的運作基礎。

四、由外包孝道的趨勢反思臺灣代間連結的轉化： 以信任為基礎的協商式代間關係

目前國內已有少數研究嘗試探討老人照護工作外購下的孝道實踐內涵，例如陳育伶（2013）發現：聘僱外籍看護的子女／媳婦並不認為此種選擇等同於不重視孝道，而是改以「父母能在家終老」以及「子女能主導照顧過程」作為孝道運作的核心條件，重新定義自己的孝道實踐，並強調此種孝道外購是考量家中長輩的照顧品質與家庭整體福祉後的最佳選擇。張國偉（2008）對使用外購式照護服務的子女之訪談也發現：較年輕的子代已不再受限於與父母同住、親自照顧父母等屬於權威性的孝道規範，居住安排與孝道觀念的關係已能漸漸互相獨立，而最主要的決定性關鍵還是在於受照顧者（老年父母）本身的意願，子女往往是為了滿足父母希望在家養老而選擇聘僱外籍看護。只是以上討論主要仍是基於聘僱外籍看護子女本身主觀角度所進行的討論，雖然在某種程度上翻轉了孝道逐漸式微、孝道阻礙老人照護服務推廣的迷思，但卻較少討論家庭代間互動運作如何將外部照護服務融入家庭系統中，也未能兼顧高齡者自身在後續外購照顧關係中的實際感受。事實上，單從是否聘僱外籍看護或是否入住養護機構等特定照護安排選擇，並無法直接決定照護品質或提升家庭的整體福祉，唯有真正從實際的代間互動探討服務選擇及服務融入家庭的整體演變歷程，才能確實掌握孝道如何影響或促進老人照護服務的使用與效益。

華人傳統的老人照顧理念較接近奠基於權威性孝道面向，即強調家庭角色階層運作下的侍奉（*servicing*）觀念，而較具平等主義的照顧（*caring*）意涵則與相互性孝道面向密切關聯（劉仲冬 1998）。侍奉式照顧關係的運作，多半期待子女必須對年老父母的需求變化保持敏感並隨時提出因應，在照顧安排選擇上也常顯現出由子女主導的特徵，但子女主導選擇最終常出現並不符合年老父母期望意願的衝突結果。國內研究即發現：許多老人在自身照顧方式選擇上雖然看似有自主權，但往往只是基於子女單方的態度或需求而做選擇或勉強接受家人的決定，最終選擇的照顧安排方式未必真正有助於提升其福祉（劉雅文、莊

秀美 2006)。因此，在老人照顧服務外部化的趨勢下，家庭代間連結的運作必須有相應的轉化，才能使老年父母照顧方式的選擇與後續的照護實踐能真正反映關懷與善待父母的孝道意涵。藍佩嘉（2010）曾根據對美籍臺灣老年移民的研究指出，老人照護的市場化或公共化並未弱化家庭連結，反而強化了代間連帶關係的運作；此種強調經濟與情感相互強化的代間連結模式，恰與中國獨生子女家庭在面臨養老壓力下逐漸形成的「協商式代間親密關係」多有呼應（鍾曉慧、何式凝 2014）。協商式代間關係的運作邏輯在於：金錢與情感在家庭親密關係中互為表裡，各種物質交換和金錢關係的介入，往往只是家人間表達關愛和共同責任的多元方式之一，甚至透過物質或金錢的交換，可幫助家庭成員解決實際問題、實現人生目標；換言之，經濟性、商業化消費意識的介入未必會直接傷害代間的親密情感，它反而是維繫代間連結的重要運作機制。

儘管上述學者皆從性別研究或家庭社會學的角度，希望破除「金錢／愛」或「市場／親密關係」的二元對立思考，使老人照顧工作的勞動性質與家庭決策中的經濟考量（尤其是親代在照顧關係中所能提供的資源交換）得到適當關注，但其研究也一致發現，此種親屬間的物質與金錢交換仍必須以長期累積的情感連結為基礎。換言之，若代間關係運作純粹是以金錢或經濟考量為核心，反而可能因為其他利益考量而使老人的福祉被犧牲，衍生出非預期的副作用，例如曾有實徵研究指出：當看護工費用由子女均分時，外籍看護常成為眾媳婦爭相運用的額外資源，連帶導致失能老人的居住模式由「固定與某位子女同住」轉變為「輪住模式」（陳正芬 2015）。而原本為了因應老人照顧需求所聘僱的外籍看護，在實際工作上卻以協助其他家務為主，也是國內常見現象。因此，如何確認這些可能被解讀為有助於整體家庭利益的照顧實踐方式，真正能反映照顧服務的功能與子代對父母福祉的考量，在目前照顧型態轉化過程中相當值得學者關注。

本文認為由照顧的角度來說明孝道外購趨勢下代間連結轉化的重點時，不僅要關切經濟資源交換形式如何轉換，也應重視在各種經濟資源密集交換過程中有助於緩衝副作用效果的情感因素給予重視，而以信任為基礎的代間互動關

係才是達成這一訴求的核心機制。多數華人社會的研究顯示：在照顧服務選擇過程中以同理為基礎的雙向溝通（而非由子女基於優先考量父母福祉單方主導決策過程），以及子女在服務使用過程中的各種情感性與社會性支持，相當有助於提升父母對不同照護服務使用的接納與適應（劉雅文、莊秀美 2006）。此外，當子女將老人照顧工作外包之後，更常能體認到老人照顧的核心要素不僅是提供勞務工作，更重要的是長期的情感連結與全然的責任承擔（曹毓珊 2002）。相對於以往由子代承擔的侍奉式照顧關係，未來在照護服務外包趨勢下的代間連結將呈現出朝基於同理、信任與長期情感的相互協商關係轉化。

五、孝道雙元模型的闡釋

另一方面，目前外購趨勢下的代間照顧關係雖更強調商業（平等）或服務（專業）導向，乍看之下似乎反映出孝道觀念的弱化，但這是由於習慣將孝道概念過度簡化為應承擔固定的養老責任內容所造成的錯覺，例如子女必須與父母同住、必須親自照顧等。若要解決這種將孝道概念界定方式過於僵化或籠統所造成的困擾，則必須將孝道概念的核心定義由容易隨社會變遷而導致不易實踐的固定行為內容，轉換為由能有效統整各式孝道行為表現的深層心理運作成分或機制來闡釋。孝道雙元模型即指出：華人孝道的運作主要是奠基於親子代間關係揉合垂直（「父母」－「子女」這一家庭角色對偶組的階序關係）與水平（基於親代與子代身為兩獨特個體所形成的對等互動關係）的雙元特性，其可由「親子代間互動心理基模」角度切入，特別抽取出「相互性」與「權威性」這兩類可反映孝道深層運作特徵的心理向度（Yeh et al. 2013）。其中相互性孝道是以自然的情感天性為基礎，反映親子間的親密連結與主動自發的情感表現；其發展源自於子女在長期日常互動中逐漸與父母累積出的厚實情感，並形成最根本的人際親和狀態，因而在普遍狀況下子女均願意相應表現出善待、關懷父母的舉動。另一方面，權威性孝道則是以「輩分－年齡－性別」共同塑造出的家

庭角色階層成分為基礎，其運作核心是子女透過對角色規範的遵從來尋求社會認同，亦即子代以其從社會文化規範中習得「好子女」這一社會角色來面對父母，並依循社會期待表現出相應的行為模式。由於父母在子女社會化歷程的特定階段中，不可避免會成為子女眼中具有絕對權威的「角色楷模」，因此權威性孝道的發展源自於子女以符合社會規範的特定行為形式來滿足父母的要求或期待。

根據孝道雙元模型觀點，當子女秉持高度的相互性孝道信念，在代間互動過程中，較關注父母個人的感受與需求及彼此親密關係的持續發展；因此，其不僅對老年父母照顧安排的各種選擇抱持較開放的態度，不拘泥於主流或文化偏好的照顧形式，也能將父母的個別差異納入考量，並透過與父母真誠地相互溝通共同達成最終決策；即使親子雙方對照顧安排出現不一致意見，相互性孝道信念亦能透過長期情感互動所累積的相互理解，對彼此的衝突採取主動化解、自我反思的因應方式（不同於權威性孝道透子女自我壓抑來避免直接衝突）（葉光輝 2009c），進而達成雙方都能認同與接受共識的解決方式。在後續照護服務的使用過程中，也能依據父母的需求與外部服務本身的運作特性展現出具彈性的照護實踐。

相對而言，講求角色責任義務的權威性孝道，主要是以追求符合文化期待或社會讚許的特定角色表現來實踐孝道，因此權威性孝道高的子女，往往固著於希望依循主流或符合固定規範內容的照護形式來實踐孝道，因而容易忽略父母本身習慣或特質的個別差異。雖然依循權威性孝道特徵而行，對於子女提供給年老父母的代間支持亦具有正向效果，但它比較接近透過特定的文化設計為老年父母設定最低限度的家庭照顧保障，因此權威性孝道信念的規範運作必須在以相互性孝道的情感運作當作基礎下，才有助於提升子女對父母的照顧與情感支持之品質，進而促進父母的社會適應與整體幸福感，否則長期而言，單純強調權威性孝道的規範與義務，常會對照顧者或被照顧者衍生出非預期負面結果的副作用。

藉由上述雙元模型對孝道概念深層的界定方式，孝道不再是無法隨社會變

遷展現彈性的固定規範內容；由於孝道的核心表徵既含括親子雙方在家庭權力階層中形成的上下角色關係，又同時兼顧個體相互間親密情感之運作，任何行為只要能體現親子間這兩種深層心理特徵，都可視為反映出孝道的意涵，因而孝道信念也就能隨社會脈絡的變遷衍生出相應的轉化行為模式。孝道雙元模型觀點不僅可用以闡釋臺灣家庭在老人照護安排選擇、實踐過程中親子代間互動歷程背後心理動機的參考架構，亦可用以作為從子代角度解釋影響代間連結形式轉化的重要心理運作機制。彙整上述討論，老人照顧資源外部化趨勢下，親子代間連結在理論層次的轉化重點為：從「家庭角色階層主導的奉養責任關係」轉化為「以信任與相互協商為基礎的相互支持關係」，而此種代間連結轉化在照護實踐上的具體展現可包含：(1) 老人福祉的關鍵指標由與子女同住轉化為整體照顧關係的品質；(2) 由「子代單向因應父母需求」轉化為「親子雙方共同滿足彼此需求」；(3) 孝道在老人保護上的運作重點由「強化奉養意願」轉化為「促成關係導向式照顧需求之滿足」。

六、結語

儘管高齡化的確可能對臺灣家庭養老功能的既有模式造成衝擊，但家庭系統各面向的運作亦可能隨社會轉型或變遷呈現與時俱進的轉化。本文對臺灣家庭外包孝道現象所做的正向解讀，恰與在正向心理學思潮下備受重視的家庭韌性（family resilience; DeHaan, Hawley & Deal 2013; Walsh 2003）概念相呼應；亦即當特定功能面向（如對老年父母的安養照顧）遇到問題時，家庭系統並未停止運作，而是會透過家庭個別成員角色的因應、成員間關係模式的調整（Walsh 2003）、尋求家庭外的資源與支持網絡（Black 2008）等運作要素，進行一系列轉化歷程來適應新的條件或情況，使家庭本身可隨著外來挑戰持續成長發展。無論是關係導向式老人照顧或以信任、協商為基礎的代間連結，都反映出家庭系統中各種運作成分的共同轉化，以及正式與非正式支持系統的相互

融入。然而家庭韌性的展現並無標準形式可言，聘用外籍看護固然是臺灣近年來使用率最高的照顧服務，但聘用外籍看護並不同於家庭在照顧實踐與代間關係上的正向轉化，無論是否使用外部服務或使用何種類型的照顧服務，仍可能循不同轉化途徑，增進對家中老人照顧需求的滿足與整體照顧關係品質。但若照顧服務的選擇、採用完全出自經濟層面的考量，則經由外部服務或資源所增加的照顧人力，也可能挪為他用，無助於改善家庭原本面臨的老人照顧需求困境。另一方面，透過引介孝道雙元模型這項本土心理學理論作為分析架構，並聚焦於以代間長期互動累積的親密信任作為動力基礎的相互性孝道面向，本文也對孝道服務外購這一新興家庭現象背後的親子關係運作提出了深入探討，具體呈現出孝道未必是各種照顧服務推廣上的文化障礙，而且也指出相互性孝道可能是促進正式照護資源、服務融入代間運作的重要機制。整體探究成果不僅可為孝道雙元模型的理論發展累積實徵證據，也為孝道概念在高齡政策、福利議題上的應用奠定合適的理論基礎。

從發展臺灣本土高齡照顧研究典範的長程目標來看，在將外包孝道概念轉換為適用於探討正式與非正式老人支持系統連結的研究架構這項嘗試上，目前的研究討論僅算是提供了初步的理論銜接。鑒於以往對外包孝道相關研究多採取質化取向，導致許多有意義的政策建議僅停留在理論訴求階段，難以落實到照顧政策的實際運作中，因此本文作者未來將繼續強化初步理論架構的實徵轉換性，針對關係導向式老人照顧內容提出清楚的向度，甚至實際的變項測量內容，逐漸形成一套亦可應用於探討服務使用、政策評估等實務問題的量化研究架構。不同於 Nolan 等人（2004）僅以主觀知覺感受來界定老人照護需求內容，本論文則希望朝同時整合客觀式（福利系統提供的具體服務項目）與主觀式（高齡者對照顧支持的感受）的老人照顧內涵發展，未來將根據系統性文獻回顧、對高齡者及其子女進行深度訪談的結果等資料，共同擬定合適的具體做法，例如：在客觀照護需求類型或項目之外，新增有關靈性層面照護需求、照顧感受等向度；或以高齡者在社會心理發展上的特徵與客觀照顧需求類型或項目相結合，在測量各種照顧需求項目內容的陳述中同時描繪出達成需求滿足的

方式或執行細節。至於在代間連結轉化部分，將繼續沿著由「家庭角色階層主導的奉養責任關係」轉化為「以信任與相互協商為基礎的相互支持關係」之理論脈絡，更深入地分析前述代間連結轉化在照護實踐上可能展現的具體行為指標，並將這些指標轉換為適合經由量化資料檢驗的假設，從不同的方法及資料來源加以檢証。

本文對外包式家庭照顧服務的正向解讀，不僅在本土化研究上有其意義，在實務發展上同樣也有其重要性。在臺灣社會中，老人長期照顧常被簡化為「聘僱外籍看護」、「入住照護機構」兩種選項（陳正芬 2015），因而對其他類型的正式照顧服務形成排擠（林明禎 2011）。事實上，不同類型的老人照顧服務只要能良好融入家庭代間連結的運作，皆有助於促進整體照顧關係與照護需求的滿足，即使在日間照顧或機構照顧等非居家照顧類型的服務使用上，家庭或家人參與仍是影響服務接受度或滿意度的關鍵（劉雅文、莊秀美 2006），例如協助接受服務的家中長輩調整作息與熟悉環境、經常與長輩討論在日間照顧中心所接觸的人事物與感受（王潔媛 2003）；經常至入住的養護機構探視與陪伴、持續付出關懷等（陳明珍 2002），這些來自家庭成員的日常互動、協助與情感支持，對於在居家環境之外接受照顧服務的老人仍有重要意義與實質助益。因此，本文以家庭代間關係運作為核心，探討正式與非正式老人支持系統相互融入的研究方向，應有助於現代臺灣民眾重新理解外部照顧服務對家庭、親子代間連結運作的正向意義，減少民眾將各種正式照顧服務誤解為弱勢者專用的福利補助或將孝道責任轉移給外人的商業行為，未來將可應用於推廣各種不同類型照顧服務的接受度或增進其執行品質。此外，近期全球的高齡照顧政策方向已轉向源起於北歐的「在地老化」理念（Pastalan 1990），因此如何實踐在地老化的理念正與照顧人力與服務資源如何配置到家庭中密切關連（Fausset, Kelly, Rogers, & Fisk 2011）。本文的分析不僅可對現行長期照顧服務政策困境下所形成的本土高齡照顧現象提出正向解讀，對下一波高齡照顧政策的可能轉向亦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孝道文化的運作是臺灣民眾在家庭與社會生活中都極其熟悉的現象，儘管

從本土心理學角度解讀孝道服務外購的運作，看似並不需要克服跨越異文化時可能衍生的理解隔閡或偏誤，但此研究其實隱含在社會變遷層次針對新／舊文化隔閡差異，以及不同學科領域在此課題處理層次差異的「跨文化」理解等議題，希望透過本文可反映出當代本土心理學研究持續在各種不同層次、面向的文化差異上不停跨越的努力。

參考書目

中央研究院

2011 人口政策建議書。臺北市：中央研究院。

內政部戶政司

2013 人口政策白皮書——少子女化、高齡化及移民。2014年2月1日，取自 <http://www.ris.gov.tw/252>。

內政部統計處

2001 中華民國 89 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臺北市：內政部。

2005 中華民國 91 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臺北市：內政部。

2006 中華民國 94 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臺北市：內政部。

2009 老人居住安排與長期照顧選擇之探討。2010年12月1日，取自 <http://www.moi.gov.tw/stat/topic.aspx>。

2010 中華民國 98 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臺北市：內政部。

2013 內政國際指標——主要國家總生育率。2014年10月20日，取自 <http://sowf.moi.gov.tw/stat/national/j026.xls>。

2014 102 年內政性別統計分析專輯：人口——四、出生數、出生率及總生育率。2015年6月1日，取自 <http://sowf.moi.gov.tw/stat/gender/102analysis1-6.doc>。

王潔媛

2003 老人使用日間照顧服務適應過程之探討——以臺北市為例。臺灣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古允文

1997 從福利國家發展談民營化下國家角色的挑戰。社區發展季刊 80:70-78。

行政院主計處

2006 老人居住安排概況。網路資源，<http://www.stat.gov.tw/public/Attachment/3225161502.pdf>，2010年12月1日。

行政院經建會

2012 中華民國 2012 年至 2060 年人口推計報告。臺北市：行政院經建會。

伊慶春、陳玉華

1998 奉養父母方式與未來奉養態度之關聯。人口學刊 19:1-32。

呂寶靜

2001 老人照顧：老人、家庭、正式服務。臺北市：五南。

2005 老人非正式支持網絡與長期照護服務使用之初探：兼論老人支持網絡類型之建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計畫編號：NSC93-2412-H-004-006）。

吳宜姍

2006 「請讓我們更靠近」——老年男性配偶照顧者針對居家服務系統運用之主觀經驗。臺灣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李光廷

2001 以臺灣的家庭價值觀看——日本介護保險制度成立的背景與條件。人口學刊 22:71-103。

林明禎

2011 「合作式競合」抑或「衝突性競合」——從日間照顧推動困境評析「長期照顧十年計畫」照顧服務。臺灣健康照顧研究學刊 10:17-35。

許敏桃

2005 臺灣老人家庭照顧之評析：護理人類學的觀點。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人文及社會科學 11(2):167-177。

張宏哲

2010 長期照護正式和非正式體系之間關係的模式——研究和實務議題的探討。社區發展季刊 132:264-277。

張桂霖、張金鶚

2010 老人居住安排與居住偏好之轉換：家庭價值與交換理論觀點的探討。人口學刊 40:41-90。

張國偉

2008 照顧工作外包化：照顧失能女性老人的家庭分工動態。社區發展季刊 121:385-405。

曹毓珊

2002 老人家庭照顧者僱用外籍家庭監護工對照顧關係影響之研究。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曹惟純、葉光輝

- 2014 高齡化下的代間關係：臺灣民眾孝道信念變遷趨勢分析（1994-2011年）。社會學研究 170:116-144。

費孝通

- 1983 家庭結構變動中的老年贍養問題——再論中國家庭結構的變動。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7-16。

黃源協

- 2000 社區照顧：臺灣與英國經驗的檢視。臺北市：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黃曬莉、朱瑞玲

- 2011 是亂流？還是潮起、潮落？——尋找臺灣的「核心價值」及其變遷。高雄行為科學學刊 3:119-145。

陳正芬

- 2009 從居住安排與社會支持體系檢視失能老人之 ADL 與 IADL 的未滿足需求。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28(1):101-134。
- 2011 管理或剝削？家庭外籍看護工雇主的生存之道。臺灣社會研究季刊 85:89-155。
- 2015 外籍媳婦照顧者與聘僱外籍看護工的本籍媳婦：二者之照顧經驗與因應對策比較。中華心理衛生學刊 22(1):67-100。

陳育伶

- 2013 從父母照顧工作外包論子女孝道實踐的意義：以聘僱外籍看護的家庭為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陳明珍

- 2002 養護機構老人之生活適應過程研究。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陳燕禎

- 2008 福利？市場？臺灣照顧產業政策之初探。通識研究集刊 12:77-100。

陳肇男、林惠玲

- 2015 家庭、社會支持與老人心理福祉：二十世紀末的台灣經驗。臺北市：聯經。

傅仰止、張晉芬 主編

- 2007 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計畫第五期第二次調查計畫執行報告。臺北市：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

葉光輝

- 2009a 華人孝道雙元模型研究的回顧與前瞻。本土心理學研究 32:101-148。
2009b 臺灣民眾的代間交換行為：孝道觀點的探討。本土心理學研究 31:97-141。
2009c 再論華人孝道雙元模型的幾個關鍵性議題。本土心理學研究 32:207-248。
2014 提升高齡者研究的應用價值才是當務之急。應用心理研究 61:29-40。

葉光輝、章英華、曹惟純

- 2012 臺灣民眾家庭價值觀之變遷與可能心理機制。刊於臺灣的社會變遷 1985-2005：家庭與婚姻，臺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系列三之一。伊慶春、章英華編，頁 29-73。臺北市：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楊國樞、葉光輝

- 1991 孝道的心理學研究：理論、方法及發現。刊於中國人·中國心——傳統篇。高尚仁、楊中芳編，頁 193-260。臺北市：遠流。

衛生福利部

- 2014 中華民國 102 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網路資源，<http://www.mohw.gov.tw/cht/DOS/DisplayStatisticFile.aspx?d=47398&s=1>，2014 年 10 月 20 日。

藍佩嘉

- 2004 女人何苦為難女人？僱用家務移工的三角關係。臺灣社會學 8:43-97。
2010 照護工作：文化觀點的考察。社會科學論叢 3(2):2-27。

鍾雨恩

- 2011 失能老人使用雙重照顧資源之探討－以機構式照護與聘僱外籍看護工為例。文化大學社會福利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

鍾曉慧、何式凝

- 2014 協商式親密關係：獨生子女父母對家庭關係和孝道的期待。開放時代 2014(1):155-175。

謝儒賢

- 2006 福利混合供給模式部門互動關係之研究：以老人安養機構為例。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系博士論文。(未出版)

劉欣怡

- 2007 蘭嶼達悟族老人照護關係：護理人類學民族誌。臺北縣：稻鄉。

劉仲冬

- 1998 女性醫療社會學。臺北市：女書文化。

劉雅文、莊秀美

- 2006 探討失能老人家庭選擇長期照護福利研究服務之決策過程——老人自主權之分析研究。東吳社會工作學報 14:91-123。

Bengtson, V. L., and L. E. Roberts

- 1991 Intergenerational Solidarity in Ageing Families and Example of Formal Theory construction.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53:856-870.

Black, K.

- 2008 A Conceptual Review of Family Resilience Factors. *Journal of Family Nursing* 14(1):33-55.

Bloom, D. E., A. Boersch-Supan, P. McGee, and A. Seike

- 2011 Population Aging: Facts,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 (PGDA Working Paper No. 71). (Available at https://cdn1.sph.harvard.edu/wp-content/uploads/sites/1288/2013/10/PGDA_WP_71.pdf)

Brown, S. L., D. M. Smith, R. Schulz, M. U. Kabeto, P. A. Ubel, and M. Poulin, et al.

- 2009 Caregiving Behavior is Associated with Decreased Mortality Risk.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4):488-494.

Carstensen, L. L., D. Isaacowitz, and S. T. Charles

- 1999 Taking Time Seriously: A Theory of Socioemotional Selectiv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54:165-181.

Chan, C. L.-W., A. H.-Y. Ho, P. P.-Y. Leung, H. M. Chochinov, R. A. Neimeyer, S. M.-C. Pang, and D. M.-W. Tse

- 2012 The Blessings and the Curses of Filial Piety on Dignity at the End of Life: Lived Experience of Hong Kong Chinese Adult Children Caregivers. *Journal of Ethnic and Cultural Diversity in Social Work* 21(4):277-296.

Chen, L., and M. Ye

2013 The Role of Children's Support in Elders' Decisions to Live in a Yanglaoyuan (residential long-term care). *Journal of Cross Cultural Gerontology* 28:75-87.

Deci, E. L., and R. M. Ryan

2000 The "What" and "Why" of goal pursuits: Human needs and the self-determination of behavior. *Psychological Inquiry* 11(4): 227-268.

DeHaan, L. G., D. R. Hawley, and J. E. Deal

2013 Operationalizing family resilience as process: Proposed methodological strategies. *In Handbook of family resilience*. D. S. Becvar, Ed., Pp. 17-29. New York: Springer.

Erikson, E.

1982 *The Life Cycle Completed*. New York: Newton.

Eurofound

2010 Measures for Social Inclusion of the Elderly: The Case of Volunteering. Working Paper. (Available at <http://www.eurofound.europa.eu/pubdocs/2010/55/en/1/EF1055EN.pdf>)

Estévez-Abe, M., and Y. Kim

2013 Beyond the Familialist State? Outsourcing Care in 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Carlo Alberto Working Papers Series 343. (Available at <https://www.carloalberto.org/assets/working-papers/no.343.pdf>)

Fingeld-Connett, D.

2008 Meta-synthesis of Caring in Nursing.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17(2):196-204.

Fausset, C. B., A. J. Kelly, W. A. Rogers, and A. D. Fisk

2011 Challenges to Ageing in Place: Understanding Home Maintenance difficulties. *Journal of Housing for the Elderly* 25(2):125-141.

Jehoel-Gijsbers, G., and C. Vrooman

2008 Social Exclusion of the Elderl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U Member States, ENEPRI Research Report, Centre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 Brussels. (Available at http://shop.ceps.eu/BookDetail.php?item_id=1700)

Lan, P. C.

- 2002 Subcontracting filial piety: Elder care in ethnic Chinese immigrant families in California.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3(7):812-835.

Logan, J., and G. Spitze

- 1994 Informal support and the use of formal services by older American. *Journal of Gerontology* 49(1):S25-S34.

Lowenstein, A., and S. O. Daatland

- 2006 Filial Norms and Family Support in a Comparative Cross-national Context: Evidence from the OASIS Study. *Ageing & Society* 26:203-223.

Lu, L.

- 2012 Aging and Quality of Life in Taiwan. *Journal of Alternative Medicine Research* 4(3):233-243.

McCance, T., H. McKenna, and J. Boore

- 1997 Caring: Dealing with a Difficult Concep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ursing Studies* 34(4):241-248.

Morse, J. M., J. Bottorff, W. Neander, and S. Solberg

- 1991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onceptualizations and Theories of Caring Image. *Journal of Nursing Scholarship* 23(2):119-126.

Mottram, S. A., and N. Hortacsu

- 2005 Adult Daughter Aging Mother Relationship over the Life Cycle: The Turkish Case.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19(4):471-488.

Noelker, L., and D. M. Bass

- 1994 Home Care for Elderly Persons: Linkage between Formal and Informal Caregivers. *Journal of Gerontology* 44(2):563-570.

Nolan, M. R., J. Brown, S. Davies, J. Nolan, and J. Keady

- 2006 The Senses Framework: Improving Care for Older People through a Relationship-centred Approach, Getting Research into Practice (GRiP) Report No 2. Project Report.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Nolan, M. R., S. Davies, J. Brown, J. Keady, and J. Nolan

- 2004 Beyond 'Person-centred' Care: A New Vision for Gerontological Nurs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lder People Nursing in association with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13(3a):45-53.

Oxley, H.

2009 Policies for Healthy Ageing: An Overview, OECD Health Working Papers, No. 42, OECD Publishing. <http://dx.doi.org/10.1787/226757488706>

Pastalan, L. A.

1990 Preface. *In Aging in Place: The Role of Housing and Social Supports*. L. A. Pastalan, ed. Pp. ix-xii. New York: Haworth Press.

Plath, D.

2008 Independence in Old Age: The Route to Social Exclusio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38:1353-1369.

Ting, G. H. Y., and J. Woo

2009 Elder Care: Is Legislation of Family Responsibility the Solution? *Asian Journal of Gerontology & Geriatrics* 4(2):72-75.

Trippel, M., D. Kulikov, Z. Davidov, and H. Groth

2011 A Truly Impossible Equation: The Future of Welfare States in Times of Demographic Ageing. St. Gallen, Switzerland: World Demographic and Ageing Forum.

United Nations

1991 United Nations Principles for Older People. Retrieved December 10, 2010, from <http://www.un.org/documents/ga/res/46/a46r091.htm>.

Walsh, F.

2003 Family Resilience: Strengths Forged through Adversity. *In Normal family processes*. F. Walsh, ed. Pp. 399-421. New York, NY: The Guilford Press.

Wang, F. T. Y.

2002 Contesting Identity of Taiwanese Home-Care Workers - Worker, Daughter, and Do-Gooder?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16(1):37-55.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Active Ageing: A policy framework. Madrid, Spain: Ageing and Life Course Program, Second United Nations World Assembly on Ageing Press.

Yeh, K. H., and O. Bedford

2003 A Test of the Dual Filial Piety Model.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6(3):215-228.

Yeh, K.-H., C.-C. Yi, W.-C. Tsao, and P.-S. Wan

2013 Filial Piet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i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aiwan, Hong Kong and China.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28(3):277-296.